



星火燃起渔阳里

□ 陈海燕

红色记忆

在上海市中心城区，繁华热闹的淮海中路与南昌路之间，有一片典型的石库门里弄建筑，被称作渔阳里。这片房屋建筑初建于1912年，兴建方是一家外资银行，为了纪念这家银行肇始于天津（天津古地名为“渔阳”），又因上海有“里弄”之说，故将其命名为“渔阳里”。习惯上，人们把环龙路渔阳里（今南昌路100弄）称作“老渔阳里”，把霞飞路渔阳里（今淮海中路567弄）称作“新渔阳里”。

这两处看似寻常的石库门建筑，却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党的初期革命活动紧密相连。这里是共产主义星火在中国燃起的地方，留下了许多动人的红色故事，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红色标识。

1920年春，陈独秀从北京南下来到上海，4月，他住进了南昌路100弄2号，这是一幢坐北朝南的二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住宅。随着陈独秀的入住，老渔阳里2号成为《新青年》的编辑部，成为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阵地。

李汉俊、俞秀松、陈望道、李达等一批新青年纷至沓来，他们怀揣理想，对共产主义有着最初的向往，对社会主义思想也有着一定的兴趣。李达就住在老渔阳里2号二层楼的亭子间。李汉俊、俞秀松等人住在三益里17号《星期评论》社，陈望道住在三益里5号，三益里（今新天地的自忠路）离渔阳里比较近。青年才俊的集聚，加速了思想的碰撞和交流，他们热烈地探讨中国革命前途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。陈望道曾回忆道，“大家住得很近（都在法租界），经常在一起，反复的谈，越谈越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”。由于前来老渔阳里2号拜访的进步青年越来越多，陈独秀不得不在会客厅挂上小黑板，上面写着“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”，老渔阳里2号成为早期革命者的汇聚之地。新思想点燃了早期革命者心中的火种，他们在这里热切渴盼和积极追求共产主义信仰。

新老渔阳里相隔不远，其间曾有一条贯通的近百米长的小道，陈独秀、俞秀松等建党先驱都在这条小道留下深深的足迹，因此被后人称之为“马克思主义小道”。1920年5月，毛

泽东第三次来到上海，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留学。青年毛泽东曾在老渔阳里2号拜访陈独秀，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。1936年，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谈道，“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，在理论上，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，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”。

这片红色里弄在党的革命活动中创造了多个“第一”。1920年8月，在老渔阳里2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，并定名为“中国共产党”。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主要起到发起组的作用，直接促进全国其他地方成立党组织，壮大了党组织的力量。在党的早期组织的领导下，8月22日，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——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，它对全国的青年团起到发起作用。当月，《共产党宣言》首个中文全译本出版，它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，这是在老渔阳里2号创办的中国第一个红色出版机构。此外，第一份党刊《共产党》月刊、第一份面向工人阶级的通俗刊物《劳动界》周刊都曾以老渔阳里2号作为编辑部。

面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，再加上党的早期组织的力量比较弱小，党组织积极发动和壮大力量。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新渔阳里6号成立后，团机关创设外国语学社，以公开办校的形式掩护党的早期组织的革命活动。杨明斋任外国语学社社长，俞秀松任学社秘书。学员多时达五六百人，刘少奇、萧劲光、任弼时等都曾在此学习。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党组织培养了一批预备党员，外国语学社

输送了一批进步青年前往苏俄留学，为我们党增添了一批朝气蓬勃的生力军。党的早期组织还注重发动工人阶级力量，陈独秀等人积极推动工会组织的建立，1920年10月，上海机器工会在新渔阳里6号召开发起会，陈独秀发表演讲，“我希望这个工会到了明年今天，就有数千或数万的会员，建设一个大力量的工会”。这次发起会作为筹备会议，为上海机器工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基础。上海机器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组织，它的成立标志着党组织开始有计划、有组织地领导工人运动。

20世纪20年代初，北洋军阀等反动势力对进步思想进行封杀，对一些进步社团和进步刊物进行抵制，试图阻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。渔阳里坐落在法租界，党组织的活动是秘密进行的，渔阳里弄堂口的香烟店经常有巡捕房的暗探前来盯梢和窥探。1921年2月，法租界巡捕房强行封闭了老渔阳里2号《新青年》杂志社，并没收了全部稿件，后《新青年》编辑部被迫迁往广州。1921年9月，陈独秀从广州回到老渔阳里2号，由于报纸上刊登了陈独秀回沪的消息，引起了法租界巡捕房的注意，派密探四处打听侦查。10月4日，法租界巡捕房以陈独秀出售《新青年》禁书为由，将其逮捕，后在各方努力下，陈独秀被释放。面对险恶的工作环境，党组织并没有被吓倒，更没有停止革命斗争，而是采取积极的斗争方式，在渔阳里继续开展革命活动。

建党先驱们在渔阳里为党的诞生做了大量酝酿和准备工作。1921年7月23日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

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（今兴业路76号，位于新天地）开幕，后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继续进行。中共一大的召开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，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。此后，老渔阳里2号作为中共中央局所在地，中共二大召开的具体筹备工作也主要在这里开展。1921年11月，陈独秀以中央局书记的名义，签署了一份重要文件《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——关于建立与发展党团工会组织及宣传工作的决议》，要求积极扩大党组织、团组织、工会、青年、妇女等力量，同时开展宣传工作，并提出扩大团员规模，“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明年七月以前超过二千团员”。中国共产党把先进力量和进步力量团结起来，在思想宣传方面做好相关工作，有利于党组织提高自身战斗力。1922年10月，中共中央迁往北京，陈独秀前往苏俄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。至此，渔阳里也光荣地完成它的历史使命。

曙光初照中华，渔阳里燃起了共产主义的星火。在渔阳里周围方圆一公里内，还分布有很多著名的革命地标，如发行《共产党宣言》中文全译本的新印刷所，为中共一大代表提供住宿的博文女校……渔阳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活动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爱国为民的初心。穿越百年时光，回顾渔阳里的历史风景，感悟革命先驱敢于创造、敢于斗争、不畏艰险、燃起星火、追求真理的精神品质，能够更好地激励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定理想信念，传承红色基因，为党的伟大事业接续奋斗。



老渔阳里2号新貌



新渔阳里6号新貌

清代廉吏徐士林的风范

□ 冯琿琿

清代京师贤良祠是朝廷祭祀王公重臣的专祠，清代官员以巡抚身份入贤良祠的，徐士林是第一人。徐士林历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朝，是清代有名的廉吏，被乾隆誉为“一代之完人”“千秋之茂典”。

徐士林（1684—1741年），生于山东文登一户寒农家，自幼立志励学，29岁进士及第，授内阁中书，为乾隆讲读。雍正五年，徐士林出任安庆知府，后升任江苏按察使、江苏巡抚等职。他深知百姓疾苦，入仕为官后，始终廉洁自律，生活俭朴、反对奢靡。《文登县志》记载，徐士林“立身端方，历宦途不为干谒。其任京师，非公务未遂与公卿接比；为道府与督藩臬交，未尝一馈送，其守身之严谨可知也”。

徐士林清廉自持，倡导节俭。他上任时，总是主仆三人，行李一肩。沿途熟悉民风，了解民情，把官吏的贪廉、年景的丰歉、灾情的轻重、百姓的苦乐记录在案，及时上奏朝廷。到任后，立即布衣私访，处理积压案件。当时江南地区县令每年都要向上级交纳“节礼”，用来弥补财政亏

空。为交纳“节礼”，县令只能向民众勒索摊派。而上面接受“节礼”既不作账，也不开收条，为贪赃提供了方便。徐士林认为这是一项弊政，必须革除。于是，他不畏权贵，力排众议，免除了上交“节礼”的旧俗，刹住了贪污受贿之风，大大减轻了百姓负担。

担任江苏布政使时，徐士林一再发布文告，力戒奢侈浪费陋习，提倡勤俭节约之风。他以身作则，身体力行，衣不求华，食不厌蔬。他在沧浪亭设“五簋脱粟宴”，用以萝卜白菜为主料的“四菜一汤”，宴请同僚、下属和乡绅，这种招待既不铺张，又不失于礼数，被称之为“徐公宴”，从此江南开始盛行节俭之风。

一般来说，地方官对进京述职十分看重，都会想方设法献上奇珍异宝取悦上司。徐士林每年有很多机会可以进京，但每次都两手空空。有一次，他终于备了一份新年贺礼给乾隆，这份贺礼竟是他的读书心得，名为《二典三谏要义》。乾隆看罢，用朱笔写道：“语不云乎，‘赠人以物，不如赠人以言也’。”徐士林对这条御

批特别珍爱，随身携带，遇到阿谀行贿之徒，他便拿出这条御批驳回。据传，徐士林将这道御批传给了做知县的儿子徐朝亮，徐朝亮也效仿父亲用其拒绝礼品。

徐士林为勉励自己，做下属下，在安庆谯楼亲题楹联：“供长生位，刊德政碑，莫非世俗虚文，试问哪件事轰轰烈烈，堪配龙山皖水；对仗工整、掷地有声的58字长联，展示了他为官清正的风范。140年后，安徽布政使吴坤修选取“白日青天”四字题嵌在谯楼大门之上，寓意做官当明镜高悬、清白廉洁，故安庆谯楼俗称“白日青天”。

徐士林还精于断案，史书称他“治狱如神”。徐士林断案态度审慎，明察详审，重调查、重证据，在任知府、按察使、巡抚期间，判明了很多疑案大案，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，“活人无数，而又无一幸免者”。徐士林把一生审理案件的记录整理为72则，装订成册。这批文献现保存在文登区图书馆内，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

贵的司法历史资料。

徐士林为政极为勤勉，几乎所有时间都花在公事上，处理公务常常达到忘我的程度。他每次吃饭只顾着快点吃完，好接着处理事务，有时就连吃的是什么都不知道。《安庆市志》记载，徐士林曾因听讼耽误用餐，家人送来粽子，他边判边吃，笔和筷子交互使用，误将朱砂当作红糖，弄得胡须、双唇尽为红色。

乾隆六年六月，徐士林病重。他想到自己为官多年只繁忙于公务，却没能好好侍奉母亲，心中愧疚不已，于是告假返乡探母，行至淮安不幸病逝。闻讯后，苏州百姓自发穿上孝服，为其送行。乾隆破例将徐士林这个地方官，祀于京师贤良祠，并将自己这位老师誉为“忠孝性成”的一代楷模。



谈及徐霞客，人们都会想到地理学家、旅行家、文学家、游圣、千古奇人这样的评价。带着对徐霞客的仰慕之情，我来到徐霞客的故里，拜谒他的故居。

徐霞客（1587—1641年），名弘祖，字振之，号霞客，明朝南直隶江阴（今江苏省江阴市）人。徐霞客故里就在江苏省江阴市马镇南阳岐村，为了纪念徐霞客，马镇如今已更名为徐霞客镇。徐霞客故里由故居、胜水桥、晴山堂、仰圣园等组成。

首先来到了仰圣园，这个园林式花园品位极为雅致，最引我注意的是池塘边泊着的一叶扁舟，据说是按照徐霞客当年出行的小舟仿制而成。徐霞客一次次放舟出行，他的母亲和家人都到胜水桥畔为其送行。

走进徐霞客故居——一座白墙黑瓦、飞檐翘角江南名居，庭内有一株相传为徐霞客亲手移植的罗汉松，郁郁葱葱、干挺枝虬。这棵罗汉松，据说是徐霞客父亲从京城带回的一个盆栽，少年徐霞客见小盆栽年复一年总长不大，就瞒着父亲，打破精致花盆，将之移种于院内天井中，小树苗年复一年茁壮成长。

晴山堂占地宽广颇为气派，3间敞连，10架进深，是1978年重建的仿明式建筑。晴山堂内陈列着一尊“徐母教子”的石雕像：母亲王孺人端坐矮凳，一手紧握儿子双手，一手抚摸着儿子肩膀，谆谆善诱。儿子跪依母亲膝前，仰着纯真脸庞，聆听教诲。母子眼神相对，温情脉脉，传神感人。母亲王氏出生于书香门第，知书达理、乐善好施，在江阴被传为美谈。徐霞客父亲去世后，兄弟分家，母亲选择与徐霞客一起生活，为他操持家务，料理生计，义无反顾地支持儿子远游。徐霞客极为孝顺，母亲在世时，他出游都确定路线，按照计划时间准时回家。每次回家都给母亲讲述游历中的奇闻异事，分享乐趣。

参观徐霞客故里后，留给我深刻印象的是两次出行：分别是第一次和最后一次。

两次出行均与母亲有关。第一次开启出行之路时，徐霞客22岁。他从小就怀有“穷江河之渊源、山脉之经络”的远行抱负，然而19岁那年，父亲去世，为了守孝，更因年迈的母亲需要照顾，加上妻子去世，留下一个3岁的孩子需要抚养，致使他的出行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。但“勤勉达观”的母亲劝导他“长而有志四方，男子事也。吾为汝治装，行矣”。并缝制了“远游冠”，嘱咐他“第游名胜，归袖图一一示我”。最后一次是筹划已久的西南之行。为了鼓励儿子，高龄的母亲让儿子陪着她出游荆溪、句容等地。两年之后母亲病逝，在家守孝3年后，徐霞客自感日渐衰老，身体大不如前，念及母亲生前对自己的支持，认为只有出行才是对母亲最好的告慰。崇祯九年，年近50岁的徐霞客毅然踏上他人生最后一次，也是最重要、最壮烈的一次“万里遐征”。

两次出行均从浙江起步。第一次出行首站是浙江天台山，最后一次的第一站也在浙江。首游历时9天，写下《徐霞客游记》的开篇《游天台山日记》；最后一次在浙江游历近一个月，写下《浙游日记》。出行结束后，《徐霞客游记》基本完成，以其文美、景奇、质实，被后人誉为“世间真文字、大文字、奇文字”。

母亲养育之情恩重如山，徐霞客对母亲情深似海。晴山堂是徐霞客送给母亲80岁的生日礼物。徐霞客于明泰昌元年六月为祝母寿而建了新的堂舍，并请人绘制了《晴转南山



□ 戎章榕

君子徐霞客

图），题堂名为“晴山”。晴山堂建成不久，在母亲80大寿上，徐霞客又邀四方文人墨客题诗作画，共庆母寿，这就是晴山堂石刻的由来。

徐家是书香世家，倍受人们尊敬。晴山堂石刻现存76块，一块紧挨一块镶嵌在大厅两旁墙上。这些碑文均是徐霞客同时代的名人书写的文章与诗词，总计近百篇。有赞扬徐家门风的，有赞颂徐母教子的，还有记述徐霞客生平活动的，文采斐然，书艺精湛。许多作者都是流芳迄今的文化名家。

参观徐霞客故里，使我对徐霞客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。一是徐霞客之“孝”。孔子云：父母在，不远游，游必有方。徐霞客谨奉孝道，母亲在世时，绝不远游。母亲过世后，他方才“不计程，亦不计年，旅泊岩栖，游行无碍”。明代文学家陈继儒言“弘祖之奇，孺人成之”。徐霞客游历也是母亲的心愿，是孝道支撑徐霞客终极一生的行走。二是徐霞客之“志”。徐霞客自小天赋聪颖，博览家中万卷藏书，有“博雅君子”之称。他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，不慕功名仕途，少年时便立下“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”的宏愿，并穷其一生实现这一理想。三是徐霞客之“勇”。从22岁启程到54岁辞世，徐霞客“达人所之未达，探人所之未知”，人生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。时人赞其“途穷不忧，行误不悔。瞬则寝树石之间，饥则啖草木之实，不避风雨，不惮虎狼，不计程期，不求伴侣。以性灵游，以躯命游。亘古以来，一人而已”。即便旅途险境丛生，几次差点失去性命，徐霞客也从未生退缩之心。

《易经》中说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，孔子讲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”，孟郊诗曰“君子量不极，胸吞百川流”。徐霞客以孝为先，胸怀大志，且勇而坚毅，实有君子之风。想到这些，我不禁由衷地感叹，君子徐霞客也！

